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当事者言】	清华大学武斗的结束（上）	陈育延
【史实辨析】	谁制造了“红八月”的恐怖狂潮	孙言诚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当事者言】

清华大学武斗的结束（上）

• 陈育延 •

（一）“7·27”的背景

1968年7月底，清华武斗进入了第四个月。如果说武斗初期414还有信心与团派“对决”，但三个月后已大不相同。被围得几乎“弹尽粮绝”的414大本营科学馆一心只想赶紧撤出，到校外再与团派“周旋”，但却被团派围了个“水泄不通”无法脱身。而已处于强势的团派，大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劲头，认为自己胜利在望，只要继续包围和“劝降”，便可结束武斗。

正在这时，1968年7月27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开进了清华园，要全面制止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这是团派和414派都没有预料到的。两派对这起“突发事件”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

工宣队进清华在拆除工事时，被围困在科学馆的414战士全部走出了科学馆，这一行动正好解救了无法突围的414，他们在客观上成了“7·27”的受益者。

这意外惊喜促使他们欢迎了工宣队，他们不在乎工宣队是谁派来的，只要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能逃离团派的包围，他们就拥护。沈如槐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了当时的心情：“我们将工宣队视为414的救命恩人”（摘自沈如槐著《清华大学文革纪事》第409页）。

但414头头们当时并未真正理解工宣队进清华的实际目的和意义，他们仍对武斗留有“后手”。头头们“还要求各个据点藏匿一部分武器，以防不测。”沈如槐描述当天的情况时说：“我们俩立刻意识到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至少是一个解救科学馆里100多人的绝好机会，于是毫不犹豫地决定：开放414防区，欢迎工宣队进校，寻找机会，设法解救科学馆的人。我们立即派人通知各个据点，欢迎工宣队，拆掉路障，交出部分武器；同时派人到动农馆用密码通知科学馆：工宣队开进清华制止武斗，做好准备，乘机撤出科学馆。由于情况不明，我们还留了一点心眼。我和但桑约定，由我出面接待工宣队，他不公开

露面，暗中掌控全局。另外我们还要求各个据点藏匿一部分武器，以防不测。”（摘自沈书第403页至404页）

但对工宣队更不理解的是团派。在7月27日当天，三万工人进清华制止武斗的混乱情况下，团派不知道这么多工人是谁派来的。包括蒯大富在内的几个头头分别给市革委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询问工人的来历。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知道是哪派来的”。我也曾给市革委打过电话，得到的是同样的答复。李钟奇副司令员当天到清华视察时，我也曾叫人扣下他的汽车，想问问他工人是谁派来的，却未见到他本人。到下午，蒯大富反倒上市革委去“告工人的状”，结果受到了批评。一头雾水的团派开始产生了疑问，就连我这个主张“停止武斗”的“鸽派”都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我当时想象的“停止武斗”，是希望由中央文革出面主持，双方坐下来谈判达到停战。而不是象现在这样，由工宣队进来强行缴械。我认为清华的事情清华自己的师生可以解决，因此我和大多数团派一样，对工人到学校来“修理”学生，不但不理解，而且很抵触。

而这时团派的激进分子们比我要看得严重得多。他们认为：工人们进校是针对了团派，是在帮助414。眼看武斗要分出了胜负，414已不堪一击。但“7·27”这天团派却看到自己的据点被工人围住，要拆除工事和收缴武器，而被围困的414却得到了“解放”。特别是看到从科学馆出来的414战士坐在大草坪上，得到了工宣队的“保护”，抵御了团派的冲击。这无疑对团派是当头一棒，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严重的对抗情绪，认为是“黑手”操纵了工宣队，来解救弱势的反动的414。团派的激进分子们，尤其是头头们，很快就将这种对抗情绪付诸了行动。当工人围楼强行要拆除工事时，遭到了团派激进分子的武力反抗。团派手里有武器，而工人只有拆除工事的工具，他们是来宣传制止武斗的。他们初来清华时没有任何派别倾向，但团派武力抗击的结果，造成了五名工人死亡，上百名工人受伤。工人一怒之下，开始抓打学生，主要是对傅反抗工宣队的团派学生，大约抓走了100多人，其中包括了团派的二把手鲍长康。

也因此，在1968年7月27日清华两派强弱分明的特殊情况下，对毛主席这次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扭转局势的手法，两派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态度：处于强势的团派进行了武力抵抗，处于弱势的414表示了欢迎。

尽管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一直偏向团派，但头脑发热、不顾大局的团派头头们仍然犯下了这个愚蠢的错误。因此在第二天1968年7月28日清晨，毛主席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这“五大领袖”时批评蒯大富说：“这一次你们很蠢，让414欢迎工人”（摘自许爱晶著《清华蒯大富》第370页）。召见几天之后，清华两派才知道“7·27”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是毛主席直接派他的警卫团8341部队组织工人进清华来制止武斗的。然而，1968年7月27日团派对工宣队的武力对抗，却铸成了不能原谅的大错。历史证明，团派在“7·27”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后一段时间及在《大联委学习班》时期反工宣队的行为，对于红卫兵运动是致命的，它促使毛主席下决心提前结束了红卫兵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武斗结束后，清华两派“同归于尽”了，全国红卫兵运动也宣告完结了。

## （二）“7·27”当天团派对工宣队的武力抗击经过

1968年7月27日当天，我是唯一全天都未离开过静斋的团派总部委员，其他总部委员都有进进出出。蒯大富多次离开静斋跑市里“告状”和“谈判”，鲍长康中午时分就因为假扮军人被抓，在静斋具体指挥武力抵抗的任传仲也不断地往各据点跑。静斋是总部所在地，蒯大富、刘才堂住二楼。我当时养病住在三楼，因此看到了“7·27”当天发生在静

斋的主要事件。虽然我不是了解当天团派武力抗击最全面的人，但却是静斋总部最真实的经历者。根据那时的日记、会议记录和随后《大联委学习班》的“交待材料”，我大致梳理出了“7·27”当天我所知道的发生在静斋的团派的主要抗击活动，简要叙述如下：

1968年7月3日和7月24日，为停止全国日益严重的武斗风，毛主席和党中央批示了广西和陕西关于停止武斗的两个布告，当时称为“7·3布告”和“7·24布告”，要求全国按此执行。清华是北京市的武斗重灾区，因此“7·27”之前曾有单位来清华游行宣传这两个布告，但只是呼呼口号就走了，并未引起团派总部的重视。

但到了7·27那天，情况有所不同，中央动真格的要制止清华武斗了。从上午9：00开始，工人就在8341部队的安排下，围住两派据点，要求拆除工事，收缴武器。

这时航空馆（总部办公室）打电话到静斋团派总部，找头头解决，蒯大富、鲍长康不在，一早去火车站接陈继芳了，但任传仲来了，他是一个星期前接手鲍长康担任团派武斗总指挥的。（鲍长康原是武斗总指挥，7·27前一星期，因“肝炎复发”退居二线。）任传仲已在清华西门布置了几道岗，阻止工人进校。但根本无济于事。工人大队人马拥进清华园，一教团派广播台最开始还广播“欢迎北京市工人来清华制止武斗”，但很快就变调为“工人快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受杨余傅（即：当时被打倒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革命集团”）黑手操纵……”等等内容了。

当时传言宣传队要抓头头，其实不是谣言，是确有其事。在后来团派搜出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小头头的笔记本上，很明确地写了要抓的头头名单。有些是音同字不同，原文是：蒯大富、包长常（鲍长康）、任传中（任传仲）、刘彩堂（刘才堂）、陈一言（陈育延），也有414的头头沈如槐、张雪梅、陈楚三、刘万璋，但我未记下他们的原字。

抓头头是为了制止武斗，但团派不这样认为，而认为是在搞垮自己。

因为不知道工宣队是谁派来的，因此，我在静斋给市革委打电话询问过。

10点钟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来清华视察，我们企图扣下他，也是为了问他工人是哪派来的。后来李钟奇徒步离开了清华，是因为团派为了扣住他，把他的汽车轮胎给放了气。

11点钟，蒯大富、鲍长康回来后，也打电话给市革委及中央办公厅询问工人的来历，但都说不知道。所以下午蒯大富才会去市革委“告状”。

后来我和刘才堂“审问”军宣队战士，也都是为了知道工宣队的来历和“背景”。当得不到答案时，就会怀疑是有“杨、余、傅黑手”操纵，企图搞垮清华井冈山，破坏文化大革命。

11点多，蒯大富回静斋后，团派怕工人冲进静斋抓人，曾在静斋周围通上电网，在铁丝网上挂了牌子“小心触电”。工人们知道头头回来了，就开始包围静斋，要求制止武斗，交出武器。实际上也是要抓头头来谈判，围了好几层包围圈，只准进，不准出，出去一个抓一个。后来看到鲍长康、高季洪等团派人员没有拿武器也被抓，蒯大富也急了，甚至想冲出去拼命。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当时眼睛就红了，拔出手枪，喊道：‘他妈的！老子拼了！’”却被工总司（团派校内工人组织）的人抱住了，不让我出去。”在这种思想状态下，蒯大富

下令抵抗，他要各据点“严守阵地，不准进攻工人，如果工人攻楼，就还击。”这种话，蒯大富在与各据点通电话时，我们也都听到过，但并没有下令开枪。

当天我大弟弟陈育平正好来清华给我送东西，工人围住静斋后，他就没出去。中午蒯大富从外面回来后，我弟弟曾听到他接到了大约是团派某一个据点打来的电话，说形势危机，问如何对付工人。蒯大富回答：“工人如果冲进来，就把他们打出去！”我弟弟后来跟我讲起这件事，我觉得他是小孩子（当时只有15岁），讲话未必牢靠，就嘱咐他别乱说。但这件事给他印象很深，因此过了几十年，他仍还记得。这至少证明了蒯大富在1968年7月27日的态度是指挥过对抗工宣队的行动的，虽然并未说“如何将工人打出去”，也并未下令开枪，但这之后团派的长矛抵抗和扔手榴弹，都与这些指挥有很大关系。对工人的死伤，蒯大富应当负有主要责任，在场指挥抵抗的团派头头们也负有很大的责任，武斗结束后被清算也是必然的。

当时蒯大富、任传仲、刘才堂、我和崔兆喜等团派总部委员基本都被围在静斋。因此，为了解静斋的围，任传仲、刘才堂、崔兆喜拿着长矛驱赶工宣队，还从静斋后门拖进来一些工人和军人，他们都没有带武器。正像蒯大富说的“工人不知深浅，不敢再围下去，包围圈渐渐没了。”静斋解围后，大约两点多钟，蒯大富跑到体院去找了一辆车，去了市革委求救。在那里见到了吴德、迟群和谢静宜，蒯大富答应停止武斗。回到清华，继续和迟群谈判。迟群要求交出打死工人的凶手，蒯大富不答应，称不清楚情况。因此，在清华园中学谈判了三个多小时，天黑尽了，才签下了“停战协议”，内容大致是：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缴武器，撤离据点。

而晚7点在静斋，任传仲召集所有在静斋的总部头头和分部头头开会。会上，无线电系的头头邢晓光说：工人占领了9003大楼（机械系的教学楼是团派的据点，我因此当时以为他是机械系头头。），有30多名井冈山战士被抓，有人被打，至今还未放出，要组织人去救他们，到会的人都同意了。任传仲作了部署，又派了几十人去。因此9003大楼是7·27当天抵抗最厉害的据点之一。

蒯大富谈判完后回到清华，已是7·27深夜，马上“召集所有在校的总部委员和分部委员在明斋开会。参加会的有：任传仲、刘才堂、我、崔兆喜、谢德明、张学琛、段永基、李康群、翁文斌、张树友等二十几人，蒯大富主持，讲了在市革委谈判的结果（四条协议）。又让大家讲了学校的情况。”

由于7·27当天蒯大富去过了市革委，知道与工人对打是闯下了大祸，也知道市革委的精神是不支持我们武斗。因此，当晚在明斋召集的总部扩大会上，蒯大富一改白天下令抵抗的态度，力主撤退，避免大规模冲突，但与工宣队对立的思想情绪未变。因此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又不甘心被缴械，所以让大家“把枪埋起来，走！给他留个空荡荡的清华！日后等中央过问就好解决了。”蒯大富同样对武斗也是留有后手的，并不认为这次撤退就是停止武斗。在这次会上，任传仲、崔兆喜不同意撤退，认为是右倾逃跑主义。因此，只好兵分两路：任传仲、崔兆喜等不同意撤退的少数人去9003大楼支援被围的井冈山战士，与他们一起“战斗到底”。这批人后来又被工宣队围了两天，一直到7月30号才通过谈判放出。而赞成撤退的，全部撤离了清华园，撤往北航和昌平200#原子基地，此时是7·28凌晨。结果撤往200#的几十人因司机瞌睡，造成卡车翻车，其中一人携带的手榴弹爆炸，造成团派人员的伤亡。后来我听说是李康群带了三个手榴弹，都开了盖，才造成了这次事故，不过他本人活了下来。

7·27当晚，鲍长康不在，他被工宣队抓了。因为中午被围的大礼堂来电话告急，鲍长康想去看看情况，但到处都是工人，而且在抓头头；这时看到被团派抓进静斋的有几个空军战士，鲍长康突发奇想，以为穿军装便于行动，就从他们身上把衣服扒下来穿上。但到了礼堂门口，工人一盘问，立刻漏了馅。很快被识破，马上被扣了下来。据鲍长康自述：开始并未打他，后来团派有人冲击工宣队，还扔了手榴弹，工宣队急了，把鲍长康暴打一顿，当时就被打晕。工宣队赶紧将他送往附近医院。醒来的时候，他已在市革委地下室。7月28日凌晨，毛主席召见时，他被送往人民大会堂门口，交还给了蒯大富；那时还穿着当时空军黄上衣兰裤子的服装，上面有血污，鲍长康说：大约是他挨打时流的鼻血。（写这段之前，我专门与鲍长康电话核实过。）

7·27当晚，清华几个主要的大门都被工宣队封锁，不能进出。工宣队要抓凶手，要收缴武器。但有一个通往北京体育学院的小北门，工宣队不知道，无人把守。因此，明斋开会后已是7·28凌晨，我们就乘坐吉普车从这个小北门逃出来，到达体院，我和蒯大富、段永基（工化系学生，当时是蒯大富秘书。改革开放后，继万润南之后成为四通公司总裁。）、张树友（机械系学生，第三动态组负责人。）找到刘长信（体院革委会主任，蒯大富的“天派”战友），换了一辆轿车，到西单电报大楼给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发同一内容九份加急电报，内容大致是：“工人宣传队进清华，有黑手操纵。我清华井冈山战士被抓被打，十分危急。要求中央救急。”当时我们四人凑钱，化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凑了四十多元全部打了电报（当时电报费是三分钱一个字），我们心里想的，就是清华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工宣队到清华校内来抓人，打人，这种严重事件，一定要让党中央、毛主席知道，必须“急告”中央。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完全信赖毛主席，也认为只有依靠毛主席才能解救我们自己，相信毛主席也一定会来解救我们的。

7月28日早晨六点左右，我和蒯大富从西单电报大楼回到北航，清华井冈山的骨干们正在那里“避难”。一到北航，就听到了中央要接见蒯大富的通知。蒯大富正急着找中央，听此通知，赶紧奔赴人民大会堂，我则留在北航睡觉。

这就是著名的“7·28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

事实证明，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确实也救了蒯大富一命。不然工宣队死伤众多的帐，要算给蒯大富，他就是有九条命来抵，工宣队都不干。

从后来传出的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的纪录稿中也可以看出，当狼狈不堪的蒯大富站在主席面前的时候，主席对蒯大富还是十分怜惜的，至少是“保护”的。

7·27那天，团派自恃是“革命小将”，有“中央文革”支持，开始根本没把工宣队当回事。

以往军宣队进校，都很温和，象个客人来给你帮忙的，凡事都以劝说、商量和讨论的形式办理。但“7·27”工人进校，态度与以往完全不同，办事坚决果断，没有商量余地，似乎后台很硬，底气很足。在学校骄横惯了的学生造反派们，非常不习惯这种变化，认为工人这是在干涉学校运动，因此高喊要抓后台、揪黑手，想把工人赶出去。

团派不同意交武器，一看工人没带武器，更加肆无忌惮，直接武力抗争，拿长矛驱赶，甚至扔手榴弹抗击。没想到工人也不是好惹的，人多势众。本来他们来清华，只是为了贯彻主席“7·3布告”、“7·24布告”，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并不想跟学生对打，所以工宣队来时并未带武器。但未料到两派交战正欢，工宣队会遭到团派如此强烈的

抵抗。最后，打急了眼了，工宣队不用武器就能收拾你们这些学生兵；不但抓你，而且打你，给你教训。工人一反击，学生立刻溃不成军，根本不是对手。不但据点被围得水泄不通，特别是顽强抵抗的9003大楼，团派一个也出不来；而且揍你没商量，鲍长康就是一例。

7月28日上午，工宣队发现清华井冈山的人都跑光了，而清华几个大门一直都被工宣队严守着。因此才会传言“井冈山人钻地道跑了”。因为人都跑了，武器也无法收缴，所以后来的工作，是动员学生回校，交武器，大联合。

“7·27”当天我的活动，曾在两个月后的“大联委学习班”上写过“检讨”，后又写入了履历。今天的回忆也是以当时的“检讨”为原始资料写成的，现将该“履历”中有关的内容也附在后面：

7月25号、7月26号，曾有北航红旗和其他单位的队伍来清华宣传主席批示的7·3、7·24布告，制止武斗。我没有见到他们，但据蒯大富讲，他们在学校绕了半圈，呼了几句口号就回去了。

7月27号上午9：00左右，航空馆（总部办公室）来说工人宣传队要拆一教的工事，找头头解决。正好蒯大富、鲍长康出去了，任传仲来了（当时他当武斗总指挥，蒯、鲍经常外出），说他已在西门布置了几道岗，不准工人进校。这时，一教开始广播，说“工人宣传队是受了杨余傅黑后台的蒙蔽，快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当时谣言很多，许多人说工人围楼拆工事的时候打学生，说工人要抓头头，说工宣队支持414，还有说带队的多是卫戍区的军人。我听到这些谣言，思想上就与工人宣传队对立起来，感到很不理解，觉得清华运动应该由清华师生自己来解决，工人为什么要到学校来整学生。我打电话问市革委，工人宣传队是不是市革委派来的。市革委一个女同志接电话，说“不是市革委派的，不知道是哪派来的。”我没有问这个女同志的名字。

10点左右航空馆刘庆打电话告诉我，李钟奇来了，到一教去了（他是当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我们和他认识）。我打电话给一教，叫他们扣住李钟奇，问他工人宣传队是哪派来的，但没有碰到，只扣下了李钟奇的汽车和司机，李钟奇徒步回去了。这时候，任传仲可能在一教。我打电话叫他们扣下李钟奇，这是错误的。11点左右，蒯大富和鲍长康回来了，静斋很快就被工宣队围住，要制止武斗，交出武器。这时，静斋周围通上了电网，不准工宣队进楼。到底是谁下令通电的，我不清楚。任传仲、刘才堂、崔兆喜到静斋来了，他们三个为了解静斋的围，拿着长矛赶工宣队，还抓进静斋几个，但没有伤亡，没有开枪，没有扔手榴弹。

这时，我在三楼让我弟弟去科学馆看叶志江，工人离开静斋后，我下楼看了一下。静斋解围后不久，蒯大富大约给礼堂通过电话（是礼堂牛又奇打来的电话），蒯大富要他们顶住工宣队。这时，崔兆喜大概在礼堂。大约在两三点钟左右，蒯大富就离开了静斋，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晚上回来才知道他到市革委去过了。

从早晨到天黑，我没有离开过静斋（因为我住在静斋），静斋未发过一枪，未扔过一颗手榴弹。

晚上六点左右，数力系（大约是十三号楼的）有一学生，名字记不得了，来静斋找任传仲批手榴弹。任传仲出去了，他找到我，说天快黑时，有一卡车卫戍区的武装士兵在招待所下车，恐怕晚上受到袭击，要几个手榴弹自卫，化学馆（制手榴弹的，任传仲负责）说要总部头头批条才给，任传仲不在，要我批个条。因我很久未管事了，怕批条不管用，他说试试，我就批了条。不知他后来领到没有（但十三号楼未打死打伤过工人）。我批了条儿给他，这是我的严重错误。

晚上七点左右，任传仲召集所有在静斋的总部头头和分部头头开会，参加会的有：我、崔兆喜、邢晓光（机械系头头）刘才堂、周大卫（冶金系头头）等，任传仲主持，先让大家

讲一下情况，我讲了打电话问市革委的情况，市革委值班的女同志讲：不知道工宣队是哪派来的。当时我的思想上是很怀疑的，邢晓光讲了工人占领9003大楼（机械系的教学楼），有30多名井冈山战士被抓，有人被打，至今还未放出。要组织人去救他们。到会的人都同意了，我也同意了，任传仲就去布置人了。其他人讲了什么记不得了，我同意了他们的行动，这是错误的。（证明人：邢晓光）

大约是这次会上，任传仲让我和刘才堂去“审问”被抓的工人、解放军，问他们是谁派来的。任传仲给了我两个从宣传队员身上搜到的本子，叫我们到明斋去，说那里抓有一些人。本子上写有这次行动前的报告、计划和要抓的头头的名字，我们都包括在内，因此更增加了我们的怀疑（这两个本子我于7月31日交给蒯大富了）。我没有搜查和毒打过军宣队、工宣队的同志，也没有指使别人去搜查和毒打过。我和刘才堂在明斋只问了两个解放军，是8341部队的，问他们是谁派来的，他们只说是自己来宣传“7·3布告”，

“7·24布告”的。而后蒯大富来了，叫我们去开总部会，我们就没有再问下去，但我们当时“审问”解放军是错误的，是对抗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行为。（证明人：任传仲，刘才堂，河北沧州农场）

7·27深夜，蒯大富召集所有在校的总部委员和分部委员在明斋开会，参加会的有：任传仲、刘才堂、我、崔兆喜、谢德明、张学琛、段永基、李康群、翁文斌、张树友等二十几人。蒯大富主持，讲了在市革委谈判的结果（四条协议），又让大家讲了学校的情况。这次会，我没有发言，其他人讲得什么我忘记了，只记得蒯大富提出全体战士撤出清华园，除任传仲、崔兆喜反对外，全部委员都同意了。当时，主要是对工人进清华很不理解。（证明人：蒯大富）

会后，我和蒯大富、刘才堂到静斋去拿自己的东西、衣服，于7月28日清晨4：00撤离清华园到达体院，在体院遇到刘长信（体院革委会主任），要了一辆小轿车，蒯大富、我、张树友、段永基（蒯大富秘书，化00学生）四人坐小轿车到电报大楼，给党中央、毛主席发电报，同内容九份加急电报，电报内容大致是：工人宣传队进清华，有黑手操纵，我清华井冈山战士被抓被打，十分危急，要求中央救急。（这是我们当时的错误认识）电报是蒯大富写的，我们都同意。发电报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央了解清华情况，希望中央接见，直接解决清华问题。当时还认为是工宣队侵犯我们，7·28主席召见后才认识到，是我们对抗了毛主席派来的工宣队。（证明人：蒯大富、段永基、张树友）

清晨六点，到达北航，北航通知蒯大富速去大会堂，中央首长接见，于是，我留在北航休息，这次，就是主席7·28召见。（摘自1968年10月我的《文革履历》）

关于1968年7月27日团派的对抗，蒯大富后来也口述过一些回忆，内容大致相似。2008年12月5日陈继芳给我发来一个电子邮件。是蒯大富1991年在甘肃青铜峡铝厂工作期间出差到东北时，与陈继芳聊起7·27时留下的录音材料。从蒯大富回忆的角度，也可大致了解7·27工宣队进校及7·28毛主席召见时的一点情况。虽然从1968年到1991年，事过二十三年，蒯大富当时回忆的人或事已很不全面，也不太准确，但这是私下谈话，讲出来的事情，肯定是当时印象最深的事情，有相当的真实性，有些事情，特别是“7·28召见”，在以后多人的回忆尤其是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中都有证实。我也将它转录如下：

#### ◇ 回忆1968年7·27——蒯大富

这是一场由解放军做后盾、工人出面，强行制止武斗的行动，有4·3万人参加，号称10万人。我们事先一点儿不知道。

1968年7月27日一早我和鲍长康开车去火车站接陈继芳，没接着，回校。越接近清华，人越多。大约中午12点多钟到清华，车开不进去，把车扔在了西南门，翻墙进校。开始根本没当回事，以为工人喊喊口号就走了。清华井冈山广播台开始广播：“欢迎北京市工人来清华制止武斗”。没多久就变调了。因为工人进校后分头包围了清华园，看出来是有

计划的行动，但也很清楚，他们不是为打仗来的，因为他们没带武器，有少数人带着镐头。工人是天派的，因为好多人是认识的。所以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后来的事。

我进了静斋后，发现慢慢地被工人包围了五、六层。往各个据点打电话，均称被包围。向北京市革委会、中共中央办公厅打电话，均声称“不知道你们那里发生的情况，我们向首长报告”。

我想，是否是杨、余、傅黑后台挑动工人斗学生，像上海王洪文砸上海联司一样，砸死几十人，硬把联司砸垮了。会不会是杨、余、傅黑后台来砸我们清华井冈山来了。当时鲍长康、任传仲、刘才堂、陈育延也在静斋。鲍长康穿上军衣，说去大礼堂去看看，却不料被工人认出来了，被工人抓走，打了。我当时下令：“严守阵地，不准进攻工人，如果工人攻楼，就还击。”这时高季洪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出去和工人辩论，让工人回去抓革命、促生产，结果上来几个青工，把他抓走了。学生出去一个，被抓一个。我当时眼睛就红了，拔出手枪，喊道：“他妈的！老子拼了！”却被工总司的人抱住了，不让我出去。

任传仲带了几十个人从静斋后面冲，工人围住楼，他就往楼里抓工人，工人不知深浅，不敢再围下去，包围圈渐渐没了，任传仲带着我们突围了出去。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灭顶之灾，就想跑出去找毛主席。下午1、2点钟，从静斋往学校西北门跑，翻墙出去，避开路上行人，一路小跑到体育学院。学校的小车都在体院，找到一辆车，开到北京市革委会，大约是下午3点左右了。我要见谢富治、吴德，要告诉他们，“清华发生了天大的事，工人把我们砸垮了，清华学生没有活路了”。

过了一个钟头，吴德来了。吴德说：“你们清华塌天了，打起来了，工人死了。”我一下子愣了，没想到会死人。吴德说：“你要把北京市工人得罪了，你蒯大富在北京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我说：“你们要把我们当上海联司砸了，我们就以死相拼。”吴德说：“我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叫来谈判”我说：“谈就谈，我们听毛主席的话”。

一个多小时后，迟群、谢静宜来了。迟群从这天起开始出现了。

谈判决议是：“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交武器”。我一口答应，回校后立即执行。

工人当时到清华来时，什么也没带，被学生撵出去后，一万多人左右仍在清华周围。迟群要求继续谈判，在清华园中学，迟群要我交出打死工人的凶手，我不答应，因为不清楚情况，也不知道工人到底死没死。就此谈了三个多小时。最后迟群让步，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回到清华园。

清华园已是一片荒凉，不见人烟，感到空得可怕。我到明斋广播台说，马上召集起来开会，我说：“现在不得了了，我们肯定把工人打死了。现在几万工人把学校包围着，如果我们留在清华，明天，最迟明天，工人就要把我们砸没了。我的意见是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也是我的一贯思想。我说：“把枪埋起来，走！给他留个空荡荡的清华！日后等中央过问就好解决了。”

此时已是7月28日凌晨1点了。听说没有人保卫我们了，大家就大包、小包，泪水、雨水，从清华附中小路跑了，各路都撤退了。我步行来到体育学院，和陈育延、段永基三人要车到市里。我们先到了电报大楼，花了50元钱，给毛主席发了封加急电报，内容是：

“昨天清晨，10万工人包围清华、血洗清华园。清华井冈山在血泊之中向毛主席呼救”。之后，又顺便给在沈阳的陈继芳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她暂勿回校。之后无处可去，只有去北航。

这时天已大亮了，才得知中央首长召见五大领袖，北航的韩爱晶已经去了好长时间，谢富治3点钟去清华广播喊蒯大富。我正想找中央呢，真是巴不得，所以直奔人大会堂西门，已经快早上7点钟了。当时浑身上下特脏，穿双塑料凉鞋，光着脚丫子，满脚泥巴，身上别个手枪，一副土匪样。我把枪放在车上，走进人大会堂大门。警卫问：“你是谁？干什么？”我说：“我是蒯大富，中央首长接见我，请通报一下。”警卫问：“带武器没有？”我说：“没有”。他摸了几下，就把我带了进去。

首先见到的是谢富治，我委屈地“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谢富治扶着我，我一边抽泣着，一边往里走。到门口，韩爱晶看见我，说：“老蒯，主席在这儿呢！”我一看，果然主



席站起来了，我立刻扑过去，嚎啕大哭，毛主席也流下了泪水，江青抽泣着，同时劝我说：“别激动，坐下来”。我像个没娘的孩子，哭着说：“主席救我！昨天杨、余、傅黑后台调了十几万工人包围了清华。”毛主席一开口就说：“工人是我派的，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我说：“不可能！根本不会是您派的，即或是您派的，他们也没有按您的指示去办。我亲眼看见他们在清华抓人、打人，我们二把手鲍长康就被他们抓走了！”

毛主席当时就冲着谢富治喊：“谁让你们抓人？谁让你们打人？马上把人放了！”谢富治听后，赶紧出去了，过了没多长时间，就把鲍长康放在人大会堂门口，并让我去看看。

毛主席总共接见了五个小时，我只听了一个半小时。毛主席批评了我们武斗，说我们得罪了工人，日子不好过。他说：“你和韩爱晶挺好嘛！让韩爱晶帮助你向工人赔礼道歉。”又说：“武斗错了，向工人赔礼道歉，这件事就算了！”毛主席同时还批评谢富治、温玉成：“为什么事先不打招呼？为什么打人，抓人？”

我当时有很大的恐怖感，因为打死了工人，工人暴怒了。本次召见参加者有，学生五大领袖，中央领导主事的都在，毛、林、陈、康、江、姚、叶、谢、温等人（迟群不在）。接见后，我们留下来吃饭，饭后对记录，后又到市革委会对记录。在对记录过程中，工宣队到市革委会找我算账，于是谢富治陪着我回清华，此时已是28日下午3、4点钟。车到清华门口，工人不让进，谢富治从车里探出身来说：“我是谢富治”，这才进去。

我们直奔广播台，我先见到刘冠美，把主席召见的事告诉了他，刘冠美一溜烟跑到化学馆。当时还有40余人坚守在那儿，听到这一消息后，好像在绝望之中遇救了，于是全部神经质地失控了，躺在地上，大哭、大笑，失去了控制。谢富治在广播台讲话说：“你们清华井冈山文革中立了大功，但武斗是错误的，打工人错了，你们要向工人赔礼道歉。”

学校的9003被困了两天，大铁门一关，馒头、水都有，当得知毛主席接见蒯后，从窗户挂出大标语“毛主席接见蒯大富，为清华井冈山撑腰”。

7月30日我又去市革委会对记录，被迫写下所谓“开枪令”的条子。当时我被工人包围，当说到7·27那天我曾经说“工人如果攻楼，就抵抗还击”时，工人们说：“写下来！写下来！”我说“写就写！”于是就把这句话写下来，签的日期是当天7月30日。这就是迟群后来所说的7·27蒯大富下令开枪的证明。

之后，我们开始了艰苦的说服工作，在北航向清华井冈山的学生们做了工作，我们挂出了横幅“向北京市工人阶级赔礼道歉！”然后到工人家，一家一家的去赔礼道歉。谢富治帮我们做工厂的工作，我们做学校的工作。事情很快平息了下来，但工人久久气不公。8月5日毛主席接见了工宣队，赠送芒果，为工人提了气。9月17日中央开会，缓和双方关系，工人开始提出“向革命小将学习！”

我分析，毛主席当时下决心制止武斗，没想到是这个后果，他当时说过：“蒯大富骑虎难下，我就把虎打死”。

（未完待续）

□ 原载《史实与求索》第12期，2018年11月，〔原标题：“7月27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开进清华园，我亲历了武斗的结束和两派相反的态度”〕

~~~~~

#### 【史实辨析】

谁制造了“红八月”的恐怖狂潮  
——兼评《王力反思录》、《戚本禹回忆录》

• 孙言诚 •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

当年被中共中央和两报一刊吹捧到天上的红卫兵的丰功伟绩——“红八月”，于今已是尽人皆知的一场对政治贱民的血腥屠杀。不少学者把它比作纳粹时代的“水晶之夜”。其实，它比“水晶之夜”要恐怖得多，也残忍得多。“水晶之夜”总共打死91人，而“红八月”打死的，仅官方公布的便达1772人。至于红卫兵杀人手段的残酷、冷血，更是纳粹冲锋队所望尘莫及的。

是谁制造了这场屠杀？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仍然是一笔讳莫如深的糊涂账。“水晶之夜”的罪责是清楚的。街头烧杀的冲锋队员固然有罪，但罪魁祸首却是纳粹党及其党魁希特勒、戈培尔、海德里希。“红八月”呢？到目前为止，承担罪责的只有抽象的“红卫兵”。近年来不少当年的红卫兵公开作了真诚的反思和道歉，但多数是没打人、甚至还制止打人的，只有极个别是打过人的，当场打死人的则一个也没有。根据当时打死人的凶手往往多于被打死者的人数来推算，打死1772人，凶手应有几千人。这几千人是彻底在历史上消失了。

尤其令人惊诧的是，当年领导红卫兵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在他们的《反思录》、《回忆录》中，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坚决反对红卫兵“破四旧”、打人。不仅他俩反对，据说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甚至谢富治，都坚决反对打人、杀人。在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坚决反对的情况下，几千凶手居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多日而不是像“水晶之夜”那样一个夜晚，杀死了一千多人，这不是嘲弄十几亿国民的智商吗？

本文拟从分析王力、戚本禹的回忆入手，揭示“红八月”恐怖狂潮的形成过程，探明这场大屠杀的真正责任人。

#### ◇ 王力如此“反思”

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这样说：

“红卫兵搞得天翻地覆的，首先是‘破四旧’运动。有些历史学家不知道毛主席对‘破四旧’做法实际态度是什么。据我和毛主席接触中的了解，他是不赞成‘破四旧’的。我也不赞成。”

“毛主席对当时的中央领导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集中目标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搞‘破四旧’这类东西，毛主席对此并没有欣赏。林彪、陈伯达也没有号召这样去搞。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新华社提倡这样搞。”

“在这一点上，毛主席对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陶铸不满意。但群众行动也不好去制止。也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1〕

按照王力的说法，从红卫兵走上街头，他就不赞成“破四旧”。毛泽东也不赞成，林彪、陈伯达也没号召，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工作人员鼓动红卫兵干的，罪魁祸首是主管宣传的陶铸。这个谎编得实在离谱。

“破四旧”是《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提出来的。“十六条”的第一条就指出，文化大革命首要任务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破四旧”。它说：

“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即“破四旧”。

“十六条”据王力讲是毛泽东要陈伯达搞的，陈伯达找了王力、关锋等人在钓鱼台十四楼着手起草。言下之意，陈伯达和王力是主要起草人。对此，戚本禹还因为没提到他而颇为不满，说起草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后来林彪和叶群也参加过讨论和修改。最后，毛主席亲自主持了讨论和审定。”〔2〕

作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毫无疑问是毛泽东亲自领导中央文革小组制定并经中央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号召“破四旧”，而参加起草的王力，三十年之后竟然说他和毛泽东都不同意“破四旧”，这不是公然撒谎吗？！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依据的就是“十六条”。他们先是剪裤管、改路名、砸招牌，很快便发展成抄家、打人、打死人。他们之所以能为所欲为，无人敢管，就是因为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有“十六条”作依据。

红卫兵组织的蓬勃发展和走向社会，是在毛泽东“八一八”接见百万革命师生大会之后。接见前，红卫兵只是个别中学的学生组织，活动也限于校内。接见后，红卫兵组织似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并迅速冲向社会。那次接见，毛泽东戴上了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献的红卫兵袖章，红卫兵的名声一下子便如日中天。毛泽东又问了宋彬彬的名字，鼓励说：“要武嘛！”表面上看，“要武”只是对名字中“彬彬”二字的调侃，实际上，毛是在用“十六条”教导红卫兵。“十六条”第四条提出：“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泽东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段出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话，下文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整个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都把毛泽东的这段话奉为圭臬。“红八月”的暴烈行动，更是与此直接相关。

王力说，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制止红卫兵的暴行，是“没有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仿佛毛泽东不知道红卫兵在杀人。这又是弥天谎言。8月是文革再发动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文革进程，连细节也不放过，一切都在毛的掌控之中。8月20日，林彪向毛泽东转送了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简报》。他显然是对红卫兵的暴行感到不安，想提请毛泽东注意。不料，毛泽东在转送文件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3〕我们无从得知那份简报的内容，但从批语来看，决不会是剪裤管之类。那种小事，林彪是不会转送的。简报反映的很可能就是抄家、打死人的事。

当年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回忆录中也记下了毛泽东对“破四旧”的态度：

“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4〕

这段回忆把三个人对待“破四旧”的态度，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作为市委书记，吴德深感承担不起这场屠杀的历史责任，所以他决心说服毛泽东结束“混乱局面”。所谓“混乱

局面”，指的就是血腥屠杀。他想不到他的“期望落空”。他用“雄才大略”、“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来形容毛泽东的回答，其实是委婉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也是要向后人厘清这场屠杀的责任。

林彪明显也不赞成打死人。他先用“这是个伟大的运动”抽象肯定“破四旧”，但话锋一转，他说“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联系前边的转送简报，他其实是在规劝。他的话和当年刘少奇说的“饿死人是要上书的”，本质上没有不同，只是说法更婉转而已。

只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对这场屠杀毫不介意。他对吴德汇报的回答是：“破四旧”动了几代遗老，“这样也好”。这完全符合毛泽东的革命思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何况，只是打死几个遗老！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破四旧”中放纵红卫兵虐杀“黑五类”所造成的恐怖景象，正是毛泽东震慑“反革命派”的重要手段。

王力自诩是在和毛泽东接触中了解到毛对“破四旧”的态度的，但他既没讲具体时间，也没讲毛泽东是如何表述的，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子虚乌有，无从判断。而林彪和吴德跟毛泽东的接触，都是在“破四旧”进行之中，他们所反映的毛对“破四旧”的态度，清晰而又明确，决非王力的谎言所能否定得了的。

王力把“破四旧”的罪责推给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在“破四旧”中，官方舆论确实起了煽风点火、助纣为虐的恶劣作用。但那绝不是“具体工作人员对毛主席思想理解不够”，恰恰相反，正是毛泽东指使他们这样做的。

8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唐平铸（《人民日报》代总编）、胡痴（《解放军报》代总编）时说：“现在学生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我们领导，在报纸宣传上，不要违反学生的潮流。”〔5〕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社论说：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

“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红卫兵的行动，真是好得很！”

从8月26日到9月1日，是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据王友琴统计，26日打死125人，27日228人，28日184人，29日200人，30日224人，31日145人，9月1日282人。8月29日正是高潮的顶峰。社论把被红卫兵殴打、屠杀的人冠以“寄生虫”、“吸血虫”、“人民的仇敌”，强调了红卫兵行动的正义性质，又称赞红卫兵的行动好得很，分明是为大屠杀推波助澜、火上浇油。这可是奉毛泽东之命而撰写的社论。有学者说，撰写、修改该社论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不知王力是否参与其中。不管是谁撰写的，该社论是奉旨行事殆无可疑。

文革结束后，“红八月”的残酷真相陆续曝光，红卫兵杀人手段的残忍，惊世骇俗。王力为洗白自己，罔顾事实，竟然说他和毛泽东都反对“破四旧”。这既表现了他推脱罪责的

无耻，也流露出他对深重罪孽的恐惧。他说是毛泽东，其实正是他自己“没想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

#### ◇ 戚本禹机关算尽

王力“反思”十五年之后，《戚本禹回忆录》出版了。和王力一样，戚本禹也竭力洗刷当年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红卫兵“破四旧”的罪恶。那罪恶毕竟太大，责任人谁都想切割。最好的切割办法就是把罪责推给别人。王力推给了陶铸和新华社、《人民日报》，戚本禹则推给了叶剑英、万里和首都工作组。

和王力不同，戚本禹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罗列“事实”，用“事实”来证明他的观点。他在《后记》中说：“我更看重我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我相信有一天，即使不同意我的立场、观点的朋友，也会承认我说的那些事都是真的。”

果然，2017年1月《红色中国》网站发表了一篇被称作“中右”人士的东夫写的文章《不可不读的〈戚本禹回忆录〉》，副题是“你可以不同意他讲的道理，但必须面对他摆的事实。”文章说，读了戚本禹讲述的查抄东风市场、写报告阻止大兴屠杀的事实，才知道原来“破四旧”是叶剑英和万里搞的。经历过文革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个说法的荒唐。但戚本禹的“事实”，确实迷惑了相当多的人。到文革一代逐渐故去之后，戚本禹描述的“事实”说不定真就成了“信史”。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妨分几个小题目，看一下戚本禹的观点和他回忆所涉及到的具体事实。

#### （一）红卫兵和破四旧

戚本禹说：“否定文革的人，总是把红卫兵与1966的‘破四旧’，所谓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联系在一起，与其中的随意抄家、乱打人、打死人和破坏文物等不文明、非人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其实这里的情况很复杂。”〔6〕

他首先把红卫兵和“破四旧”作了一个切割。按照他的说法，把红卫兵和“破四旧”的红色恐怖联系在一起，是否定文革的人的别有用心。但是“破四旧”毕竟是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没有红卫兵就没有“破四旧”，直接切割于理不通，所以戚本禹用了一句含糊的话：“这里的情况很复杂。”

复杂就复杂在“破四旧”上。前面说过，红卫兵敢于肆无忌惮地“破四旧”，就是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对此，戚本禹并不否认。他说：

“本来‘破四旧’是十六条提出一个口号。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红卫兵小将上街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时，我们都讲了话，给以支持。《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赞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7〕

既然“破四旧”的活动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那么“破四旧”的罪责理应由中央文革承担。但是，戚本禹话锋一转，轻轻的一句话，就把责任推掉了。他说，虽然“破四旧”是革命行动，“但是，后来在某些权势人物的唆使下，把‘破四旧’行动演变成了一场乱抄家、乱打人、打死人……的非法行动。”是什么权势人物呢？“据文革小组当时的调查了解……是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控制的。王任重在里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8〕

在这里，戚本禹又进行了一次切割——切割“破四旧”。即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的“破四旧”本来是革命行动，后来在叶剑英唆使下才演变成了红色恐怖的非法行动。因此，打死人的责任应该由叶剑英和王任重承担。（按：王任重和首都工作组毫无关系，只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中和江青有矛盾，戚本禹就把他也拉上了。）这种切割，只能骗骗没经历文革的年轻人。

红卫兵走上街头是8月19日，当天就打死了人。8月24日打死人的数目上了两位数，26日上了三位数，9月1日打死人的高潮结束。前后不过十二天，何来演变？在这十二天中，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人民日报》狂热地吹捧红卫兵，从未间断，吹捧的内容正是他们的抄家、打人。8月31日，正值“红八月”的“红色恐怖”高潮中，毛泽东第二次检阅了红卫兵，对红卫兵的“破四旧”大加赞赏和鼓励。在检阅之前，林彪审定别人为他起草的讲话稿时，在“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这段话后边，加写了“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毛泽东作最后审定时批示给林彪：“这样修改很好。”〔9〕

当然，叶剑英、王任重也吹捧红卫兵“破四旧”。那段时间。举国上下无人敢不吹捧，就连最敢讲话的陈老总，也说：“群众运动打死几个地主有什么了不起的。”〔10〕大家吹捧，是因为都在看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脸色行事。现在始作俑者不承担责任，却拉追随者垫背。戚本禹自己在回忆录中承认了对红卫兵“破四旧”“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红卫兵小将上街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时，我们都讲了话，给以支持”，可是却一点不反思自己的罪孽，还用垫背者来洗清自己，手段未免低下。

## （二）关于首都工作组

戚本禹把“破四旧”的责任推给叶剑英，主要根据就是首都工作组主持了“红八月”的遣返。他说：

“就在红卫兵上街进行‘破四旧’的1966年8月，首都工作组以加强首都安全的名义，实施了一项把一些居住在北京城里的地、富、反、坏以及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人驱赶出北京的计划。而他们用来出面执行这项计划的主要是一些高干子弟的中学生带头。”

“我记得在一次毛主席参加的中央会议上，叶剑英还向主席汇报了把一批人驱赶出北京的事。当时主席对这种做法是有疑问的，主席认为只要这些人没有现行的破坏活动，那就应该就地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管，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地赶走。主席说你把他们赶到农村去，那叫农村怎么办啊？由于主席的表态，总理就中止了这个计划的实施。”〔11〕

首都工作组确实实施过一次遣返，但不是在“红八月”，而是在它刚成立的1966年5月。周恩来在1967年1月曾对此事作过说明：

“文化大革命初期，总要把地、富、反、坏弄走，有些不稳定的人也调一调。组织一个工作小组，但又担心扩大，有点踌躇。请示主席，主席指示，除个别劳改犯外，其它自己消化，不要把矛盾上交，也不要矛盾下放。”

“六月十日我请示过主席，六月十三日回来，传达主席指示，这个工作就停了。当时将一些坏人向新疆送了些，可能送的多了些。”〔12〕

这次遣返和“红八月”红卫兵的遣返是两回事，它根本不是由“高干子弟的中学生”出面执行的，那个时候中学生还在上课呢。据张民讲：“按当时规定的政策，第一步是清查，

第二步是通过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民委员会，说服、动员其迁出北京。”〔13〕具体遣返了哪些人，由于看不到档案材料，不得而知。

戚本禹把首都工作组5月实施的遣返挪到8月来，目的就是洗清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纵容红卫兵的罪责。他以为把事情推给首都工作组，罪责就可以让叶剑英承担了，因为叶是首都工作组的组长。其实首都工作组所做的一切事，第一要负责的是毛泽东，其次是周恩来，叶剑英不过是具体执行者。关于首都工作组的成立，周恩来在1967年讲过：

“我总想向你们说一个问题，一直没有时间。去年三、四月份罗瑞卿的问题被林副统帅揭发出来，后来彭真的问题也揭发出来了，首都安全问题也被提出来了。主席上半年没回来，就是因为不安全。主席在北京总的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根据主席指示，林彪提议成立一个北京工作组，准备处理这个问题，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14〕

原来因为毛泽东感觉北京不安全，不敢回来，所以指示林彪解决这个问题。林彪提议成立北京工作组，于是周恩来着手筹备，然后再由毛泽东批准，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这个由毛、林、周共同策划的神秘机构，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事无巨细均由毛泽东拍板的凌驾在政治局之上的机构。戚本禹把“破四旧”的责任推给首都工作组，以为这样毛泽东就洗白了，结果恐怕适得其反。5月指示首都工作组遣返和8月纵容红卫兵遣返，主意都是毛泽东定的。

### （三）查抄东风市场

查抄东风市场是戚本禹所谓反对红卫兵打人的铁证，《回忆录》对此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戚本禹讲，红卫兵走上街头乱打、滥杀后，“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记者反映到文革小组来”，“为此，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开会作了讨论，周总理也参加了”。“总理和江青让我立即去了解情况，并去制止老红卫兵这种乱打乱杀的暴力行为。总理还派了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和我一起去。”〔15〕于是就有了查抄东风市场的精彩一幕。

笔者曾面对面听戚本禹讲过这段经历，有些细节比《回忆录》所写还要血腥。用不着怀疑这段史实的真实，那种血淋淋的场面，非亲历者编不出来。但是这件事绝对不是发生在“红八月”，而是在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重要通告》之后，即66年的11月下旬。

关于这份通告的出笼，吴德曾经这样讲：

“那时（是）武斗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了。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一直到11月18日，我们当时都搬到京西宾馆办公了，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16）

戚本禹正是根据这个通告才去查封的东风市场。陈伯达取缔六中劳改所也是这个时候，《陈伯达遗稿》同样用这事说明自己反对打人。殊不知9月6日陈伯达还去六中支持红卫兵，那时六中劳改所已经打死人了，陈走后，六中红卫兵又打死学生王光华。

吴德的回忆是真实的，直到10月份中央文革小组还在维护毛泽东的放手发动群众、不准压制红卫兵的决策，连一份制止打死人的通告都不准发布，怎么可能在“红八月”开会研究红卫兵打人问题，还派戚本禹去查抄东风市场呢？戚本禹说是周恩来派他去的，我们不妨看看文革中周的讲话：

“东风市场设了点，有四间房子关了八个人，我想去，不方便。周荣鑫同志去过，雍文涛同志也去过。设点押人不能搞。”（17）

这是9月25日周恩来对首都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负责人的讲话，目的是婉劝红卫兵不要设点打人。直到9月下旬，周荣鑫和雍文涛都对东风市场的打人据点束手无策，周恩来的规劝也透着苦涩和无奈。如果“红八月”周恩来就派戚本禹抄了东风市场，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

戚本禹说，红卫兵乱打滥杀的情况，是记者反映给中央文革的。“红八月”之后，确有一位《解放军报》记者采访过东风市场，他在叙述了目睹的惨状后，说：

“回到报社，对东安市场（按：文革中改名东风市场）红卫兵发生的过火行为，我连夜写出情况反映送往中央文革。没想到第二天下午就传来，要记者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专门宣读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段语录。”（18）

这才是中央文革在“红八月”中的真实态度！诚如戚本禹所说，他们完全知道红卫兵的乱打滥杀，他们不缺乏了解情况的渠道。但是，在毛泽东不准压制红卫兵的指示下，在中央出台《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规定》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形势下，他们不会也不敢开会研究制止红卫兵乱打乱杀的暴力行为。他们不仅自己不制止，还坚决反对别人去制止。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解放军报》记者的采访反映，都是例证。类似的事还有不少。直到9月2日，周恩来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要求红卫兵不要打人，拘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商定，讨论的时候，中央文革的人还坚决反对，致使该意见胎死腹中。

或以为戚本禹毕竟查抄了东风市场，这不也能证明中央文革反对老红卫兵的乱打、滥杀吗？笔者拟借用戚本禹的一句话：“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查抄是11月下旬，也就是冬天进行的。1966年的冬天和夏天，那可是乾坤大转移。毛泽东曾经说过：“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了。”（19）这部分人就是夏天“破四旧”、冬天“刮黑风”的老红卫兵。夏天，他们在学校里造反，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殴打校长、老



师，打死人；冲上街头“破四旧”，抄家、批斗，打死“黑五类”；革命豪情高万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他们百般呵护、怂恿、支持。冬天，他们保爹、保妈、保工作组；上街贴大字报，刮“黑风”炮打中央文革，变成了“反革命”，遭致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严厉镇压，部分老兵甚至被关进监狱。东风市场打人打了三个多月，为什么没人敢管？11月下旬，中央文革为什么又查抄了它？道理就在于此。戚本禹把他冬天镇压老红卫兵的事搬到“红八月”来，企图以此掩盖他们夏天的罪行，心机虽深，但骗不了从文革走过来的人。

其实，王力也好，戚本禹也好，一直到关进秦城监狱，他们始终没有停止对红卫兵“破四旧”的歌颂。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记录红卫兵“破四旧”丰功伟绩的《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竟然是会议文件之一。也是在那个时候，林彪指示办《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筹办工作。1967年春末夏初，筹办就绪，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在陈伯达带领下到展览馆接见工作人员。据当事人回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们个个脸上泛着罕见的红光，一副春风得意的神态，颐指气使。”〔20〕不知道那时“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戚本禹是否像他在回忆录中说的，认为“破四旧”是“随意抄家、打人、打死人”的非人道行为？这个展览办了两年，一直到1969年初才结束。到那时为止，社会上一直无人敢对“破四旧”说半个不字，而王力、戚本禹其时已经在秦城监狱了。

#### （四）关于大兴“八三一”事件

大兴屠杀“黑五类”，是“红八月”恐怖狂潮的巅峰。谈“破四旧”，这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笔者曾和戚本禹交往一年多，关于文革的经历，他曾系统地对笔者谈过。由于研究的需要，笔者最关心的是青海“二二三”事件和大兴“八三一”事件。前者他向笔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而后者，除了说他曾经到过大兴之外，基本上一无所知。然而，在《回忆录》中，戚本禹却把自己描写成大兴事件的亲历者和终结者。他这样说：

“在得到大兴县发生大屠杀案的报告后，我和王力连夜驱车赶去大兴，可等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那些主持大屠杀的人却早已经得到了风声跑了。”

经过调查了解，加上时任大兴团委书记的康生孙女的帮助，他俩终于弄清了情况，然后：“我和王力当夜赶回钓鱼台，已经凌晨四点多。回来后我马上给我熟识的北京新市委的书记马力打了电话，让他去处理这件事情。第二天，马力就亲自带着人去了大兴县。马力代表北京市新市委当场宣布，如果再发生乱打人、乱杀人的事，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21〕于是，大兴的屠杀停止了。

故事编得很好，可惜不是事实。他没说他和王力是哪一天去的大兴，但马力去大兴是9月1日清晨，按戚本禹所述推算，他和王力去大兴理应是8月31日。8月31日是大兴屠杀最疯狂的一夜，亲历者有具体描述：

“我当时在中共大兴县委农村工作部任干事，后被机关群众推选为‘文革组长’。‘八三一’事件的当天夜里，我被县委书记王根亢叫醒，说东方红公社（现为北臧村乡）马村大队正杀害‘地、富、反、坏’及其家属，马上组织人前往宣传《十六条》，制止杀人。我闻风而动，叫醒文革成员、县委组织部干事张绍千……等10多人陪同王书记驱车前往。”

“9月1日凌晨1点左右，我们来到新立村与马村交界处就被马村的民兵阻住了。他们各个手持木棒、铁棍，有的还手持铁锨、刀子，对我们如临大敌，不准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原来，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的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我们的位置在村子的东侧。我们对拦截者说单位、亮身份、谈目的，一直乞求到金鸡报晓也没让进村。这

时，北京卫戍区的张益三同志驱车而来，又进一步与阻拦进村者晓以利害，他们仍坚定不移，任你说破嘴舌，只能听到四个字：‘不准进村’。”〔22〕

张益三是和马力一起被市委派去大兴的（不是戚本禹打电话叫去的）。此事，吴德在回忆录中讲得很清楚：

“大兴、昌平发生了乱打乱斗，一夜之间打死了几十人……我们立即派人去制止，结果，派去的人进不了村子，村子边都站了岗，不让进，就像禹作敏一样。〔23〕我们说市里派人去不行，让卫戍区派人去。被派去的是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张益三和市委的秘书长马力。”〔24〕

8月31日的夜晚，大兴县的恐怖气氛远非“水晶之夜”可比。村内杀人，村外布岗，严禁出入。县委书记带十几个人、市委派卫戍区政委去，都进不了杀人现场。他们不断地冲锋，直到9月1日的黄昏时分，才冲至第三道防线，王根亢厉声吼叫：“你们不让我们进村，就先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站岗的民兵经过请示，这才放他们进去。现场的惨状，令人毛骨悚然。而戚本禹说他和王力一到大兴，“那些主持大屠杀的人却早已经得到了风声跑了”，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尤其荒唐的是，戚本禹还说他为制止大兴屠杀打过报告：

“在亲自到现场调查，综合各方面反映的情况后，我跟陈伯达说，我们得赶紧给毛主席、给中央写个报告，制止这种事情。不然的话，还会出大事的。陈伯达让我来写。于是我去找了关锋和王力一起商量。”

“我们的报告是1966年8月26日写好，先送给陈伯达、江青，第二天江青和陈伯达就在上面签了名，上报给主席。第三天8月28日上午，主席一起床就批了。”

“8月29日下午，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我们）特别谈了在大兴所发生的灭门惨案。主席听了就问，这又是谁的发明啊？总理说，中央肯定没有这样布置过。谢富治也说，公安部事先并不知道这事。叶剑英则一声不吭。”〔25〕

故事编得有声有色，时间逐日排列，毛、周、谢的讲话口吻逼真，不由得令人叹服。可惜故事有悖常理。大兴县杀人是8月27日开始的，戚本禹居然在26日写出了报告。中央29日研究了大兴的问题，大兴县却在31日大规模杀人。离奇的是，戚本禹、王力那晚还赶到大兴把杀人者吓跑了。

难道说是戚本禹记错了日子？不是。因为戚本禹和关锋确曾在8月26日给毛打过一个报告，毛批了，而且专门于29日召开常委扩大会研究了该报告。此事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上有记载。29日的常委扩大会，在逢先知、金冲及的《毛泽东传》上也有记述。但那报告肯定不是关于大兴屠杀的，因为那时候还没开始屠杀。戚本禹为了证明确实写过关于大兴屠杀的报告，就把这个报告拉来顶差。殊不知他并不清楚大兴屠杀的来龙去脉，本想移花接木，反而弄巧成拙。

关于大兴“八三一”事件的经过，笔者在《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一文中曾有论述。〔26〕事件起因于榄杆市事件。8月25日，小房产主李文波砍伤了抄他家的女红卫兵。在举国上下视红卫兵为天兵天将的时候，李文波的行为无疑大逆不道。尽管他被当场打死，事情却并未了结。中央专门开会研究，周恩来、谢富治立即发表公开讲话，把事件定性为阶级报复。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讲话尤为出格，他竟然说：“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不对。在气愤之下，打死也就算了。”“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着。”于是整个北京市刮

起了复仇的旋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负责人在大会上说：“阶级敌人用白色恐怖向我们进攻，我们要用红色恐怖来还击。”（27）红卫兵由打“黑五类”，发展到打狗崽子，“破四旧”每天打死人的数目由两位数跳升到三位数。

“这股腥风刮到大兴县以后，有人讹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要‘反攻倒算’、‘妄想变天’、‘阴谋杀害贫下中农’等等。一时间阴风四起，铺天盖地而来……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28）

这次恶性屠杀事件，起因于爱护、支持红卫兵，直接导火索则是周恩来、谢富治的讲话。据《北京日报》社1985年2月编的《宣传手册》讲，大兴县公安局8月26日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各派出所纷纷行动，27日就展开了屠杀。“有的人造谣说：这事（指杀人）公社知道，县里知道，市里知道，连周总理都支持。”（29）

戚本禹显然也知道一些内情，所以他在《回忆录》中竭力撇清周恩来和谢富治的责任，却把罪名按在万里的头上。他说“在大兴县发生的灭门惨案中，也是当地公安部门根据万里等人的指示提供名单”。明明是县公安局会议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戚本禹却说是万里的指示。明明是派出所利用基干民兵联手村干部杀人，戚本禹却说“也是老红卫兵支持搞的”。如此信口雌黄，目的只有一个：洗清有罪的“左派”，把污水泼在主张改革的叶剑英、万里身上。

#### ◇ 红卫兵如何走上杀人道路

王力、戚本禹说中央文革反对“破四旧”，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破四旧”所针对的地、富、反、坏、右，不是文革斗争的大方向，而他们是始终把握斗走资派这个大方向的。“破四旧”是走资派为转移斗争方向挑动、引导红卫兵去搞的，王力点了陶铸的名，戚本禹则举出叶剑英、万里。

走资派，或者说一切当权派，当然欢迎“破四旧”。在“炮打司令部”的形势下，当权派人人恐慌，巴不得把祸水引向地、富、反、坏、右。这一点，在地方上表现尤其明显。各省的方面大员，接过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旗帜，纷纷组织官办红卫兵，让他们走上街头“破四旧”。典型的如西南局的李井泉、中南局的王任重、西北局的刘澜涛、湖南的张平化、上海的曹获秋、杨西光……一段时间里“捉黑鬼”、“斗鬼风”甚嚣尘上。偏远如青海，王昭也把佛教大师喜饶嘉措拉出来，鼓励红卫兵去破他的四旧。

但是，北京的“破四旧”却不能用这个理论去套，因为北京的红卫兵是毛泽东支持的。毛泽东支持他们，正是因为他们的大方向正确。北京红卫兵打死人，不始自“破四旧”，而始自中学生斗黑帮。第一个打死的，是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此后不断有学校领导和教师死于“左派”学生、红卫兵之手。是几十名、上百名的教育工作者的牺牲，刺激起红卫兵运动的恐怖狂潮。有个北京红卫兵这样描述他们当年的经历：“从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到抡起皮带扬铁棍，打死老师打流氓，最后，定格在旧社会残存下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身上。”（30）

“破四旧”打死“黑五类”，不过是打死教育工作者的延伸。到8月下旬，二者合流又互相激励，遂愈演愈烈。校长老师都敢打死，地富反坏右又岂在话下。

余英时曾提出，“中国是一个最讲‘尊师重道’的古老文明古国，而且尊师的传统从未间断过。”“为什么文革爆发后，第一个暴力行动便指向老师呢？”他认为这是个值得讨论的大问题。其实，这问题说大很大，说简单也简单，红卫兵不过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文革前，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指斥教育界，有些话说得很严重。例如：

“无论哪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那里的教授、教员以及行政工作人员，过去都是替国民党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31〕

“我们过去自己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我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人统统收下来，逐步改造。有一部分人改好了，另一部分人还是照他们的老样子。你叫改造，他们不听你的。”〔32〕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33〕

“我们被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34〕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35〕

只要读读这些讲话，红卫兵对师长们痛下黑手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就是身边的校长和老师，这对那些错过了革命战争年代而又急于当革命接班人的干部子女们意味着什么？请看两位干部子女的对话：

马（笑冬）：我当时就觉得文革给我们这代人提供了革命的机会。

叶（维丽）：这种想法在干部子弟中挺有代表性。……很多干部子弟急于证明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我后来看到一个16岁的干部子弟写的日记，他参加了7月底江青第一次接见北京中学生的会。男孩在日记中说（大意）：“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刀已经磨得很亮了，我的刀在哪？”这个日记表现了那些有资格革命的青少年的心理，箭在弦上，露出一股杀气。〔36〕

这批杀气腾腾的干部子女如何走上了杀人的道路，倒真是个值得讨论的大问题。巴金说：“孩子们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不谈长期的狼奶教育，单就“红八月”看，“孩子们”杀人也不是一夜之间练成的，他们经历了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发生在8月初，即文革再发动之始。高潮的推手是撤销工作组。

早在1964年，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高干子弟，从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谈话中，知道了毛对教育战线的不满，他们遵从“学校应把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的教导，以不贯彻阶级路线为名攻击学校领导，是为“四、六、八学潮”。学潮被北京市委化解。

1966年6月，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组织红卫兵，仍以相同理由造学校领导的反，他们遭到工作组的抵制。

两次学潮，都是遵从毛的讲话闹教育革命，文革发动，他们自然代表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北京市委、刘邓工作组站在他们对立面，自然就是反动路线。其实，工作组也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搞教育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校长和老师。不同的是斗争方式，一个要放手发动群众，让学生大闹天宫，一个则想用传统搞运动的方式。7月29日，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又撤销了禁止乱斗的1966年310号文件，学生们彻底获得了解放。

很快，把阶级路线推向极致的“对联”出现了，“红五类”学生（其实是高干子女）自我感觉极度膨胀，老子天下第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开始动手了。8月4日，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在北大万人大会上用皮带抽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在座的中央文革大员无一人出面阻止。江青还当众拥抱彭小蒙，称她“小太阳”，说中央文革和“革命小将”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点名赞扬了北大附中红旗和彭小蒙。这无异于给造反学生的野蛮行为火上浇油。

从此，中学生放开手脚批斗黑帮了。典型案例如四中和八中的游斗，师大女附中的“八四”殴打校领导和“八五”游斗打死副校长卞仲耘。其时，中央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高层斗争惊心动魄，谁也不敢管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卞仲耘被打当晚回家对丈夫说：“她们打死我就像打死一条狗一样。”胡志涛去了西城区委，说：“我们的生命没有保障了。”区委根本不管。回到家，她丈夫说：“怎么打成这样？”她说：“工作组走了，没人管了。”第二天早上，她去北京市委求救，市委把她支到中学文革办公室，办公室说我们刚成立，没法管。她们不敢不回学校，结果那天胡志涛惨遭毒打，卞仲耘被打死。

笔者赞成叶维丽的看法：“这一阶段出现的暴力，在我看来，在‘文革’的‘再次发动’中，起了特殊的威慑作用，具有其他形式不可代替的功能。”

第二次高潮是8月中旬到8月25日前。标志性事件是8月13日的批斗小流氓大会和8月19日的批斗黑帮分子大会。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革命师生，则是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批斗小流氓大会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主持的。由于在会上残酷殴打批斗对象，对中学生震动很大。请看两个中学生的回忆：

“那次在北京市召开了一场斗争大会，场面非常大，我后来回想应该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我们学校的学生都去了。会是在傍晚开的……在开会的过程中突然有人从看台上冲下去，打那几个被斗争的对象。我感到震惊……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暴力，在暮色苍茫中一个像古代罗马角斗场那样的场地。”（37）

“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十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座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人制止。”（38）

批斗会后各中学掀起打流氓的狂潮，红卫兵把周围胡同的小偷流氓抓进学校，严刑拷打，校园暴力增加了新内容，关押黑帮老师的劳改所、教育室扩大了收容队伍。这次是往死里打。人大附中因打死“四龙一凤”中的凤而名噪一时。师大女附中打死周围饭店的一名女服务员。两名被打死者都不过18岁。各中学红卫兵打死流氓的事时有发生，这为几天之后冲上街头打地、富、反、坏、右开了个极其恶劣的头。

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黑帮分子，是为四、六、八学潮翻案的大会，批斗的主要对象是彭真内弟、市委教育部部长张文松和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四、六、八中的校领导陪斗。会上，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席群情激昂，不断有红卫兵冲上台抡起铜头皮带抽打批斗对象。李晨被打得头破血流，拉回后台冲洗后再押回批斗。八中校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副校长温寒江被打得当场昏厥。

这次批斗会后，校园暴力急剧升级。当晚，北京外国语学校打死教师张辅仁、职员张福臻；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从19日开始连续被打三日三夜，于22日被打死。此后陆续被打死的有八中支部书记华锦、景山中学工友李锦坡、白纸坊中学支部书记张冰洁、北师大附中教师喻瑞芬、人大附中老师杨俊、第十五女子中学支部书记梁光琪……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毛泽东有一个讲话：

“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39〕

已经打死那么多人了，毛泽东还认为乱得不厉害。“呼吁书”号召红卫兵不要打人，毛泽东却认为太文明了，是惊慌失措，对打流氓倒有些不以为然，对暴力批斗黑帮却不置一辞。这大约就是“掌握斗争大方向”吧。

第三次高潮是8月25日，也就是桅杆市事件之后。由于事件定性为“阶级报复”，红卫兵掀起红色恐怖复仇狂潮，大量的人被打死。新风霞在《绝唱》一书中说，8月26日到28日是北京市“打全堂”的日子，她听到红卫兵说：“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一个也跑不了。”最后，终于引发了昌平、大兴的大屠杀。

“红八月”的乱打人、打死人，是在一片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氛中公开进行的。据卞仲耘的家人回忆，他们去火化卞遗体的那天，城里到处红旗飘舞、锣鼓喧天，和他们的悲戚心情形成极大的反差。整个十年文革，“红八月”一直是革命的象征，是红卫兵引以自豪、官方媒体反复赞颂的“丰功伟绩”，谁胆敢否定“红八月”，谁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而王力、戚本禹却在几十年之后说他们当时就反对“破四旧”。当年他们的革命表演有目共睹，他们会在那个时候充当反革命？

不能否认，毛泽东、中央文革确实都说过不赞成打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话，“十六条”也明确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打死这么多人的事呢？问题出在，他们认为推动运动发展、实现革命目标远比打死人（何况是打死阶级敌人）重要得多。红卫兵打死人的时候，他们不仅不出面阻止，反而鼓励红卫兵继续革命。他们是拥有绝对权力的最高统治者，他们的态度理所当然地引发了恐怖狂潮。

注释：

1，《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644页。

2，《戚本禹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4月第一版。第474页。

3，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438页。

4，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27页。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5月第一版。第52页。
- 6, 《戚本禹回忆录》,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 2016年4月第一版。第474页。
- 7, 《戚本禹回忆录》,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 2016年4月第一版。第474页。
- 8, 《戚本禹回忆录》,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 2016年4月第一版。第474页。
- 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118页
- 10, 《陈毅在外交部关于红卫兵扫四旧的讲话》1966、08、30, 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010年版。
- 11, 《戚本禹回忆录》,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 2016年4月第一版。第475页。
- 12, 《周恩来接见科学院京区各单位代表谈话纪要》1967、01/21。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010年版。
- 13, 张民《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年4月。第100页。
- 14, 《周恩来接见科学院京区各单位代表谈话纪要》1967、01/21。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010年版。
- 15, 《戚本禹回忆录》,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 2016年4月第一版。第482页。
- 16,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年1月第一版。第28页。
- 17, 《九月二十五日周总理在接见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讲话》, 载联合编辑组编《首长讲话选编》, 1967年3月, 第156页。
- 18, 李景荣《狂热? 幻灭——红卫兵运动剪影》, 载《那个年代中的我们》, 远方出版社, 1998年9月第一版, 第119页。
- 19, 《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 载《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版, 第1961—1968年卷, 第290页。
- 20, 丁大华《世所罕见的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 载《文史精华》2008年第一期。
- 21, 《戚本禹回忆录》,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 2016年4月第一版。第484页。
- 22, 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 载《那个年代中的我们》, 远方出版社, 1998年9月第一版, 第399页。
- 23, 禹作敏: 80年代天津大邱庄的庄主。庄内曾私自打死人, 并拘禁办案人员。天津公安局动用400名武警封锁大邱庄, 村民和工人持棍棒、钢管与武警对峙。1993年禹作敏被捕, 判刑20年。
- 24,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年1月第一版, 第38页。
- 25, 《戚本禹回忆录》,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 2016年4月第一版。第486页。
- 26, 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 27, 引自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开放杂志出版社, 2004年5月第一版, 第267页。
- 28, 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 载《那个年代中的我们》, 远方出版社, 1998年9月第一版, 第398页。
- 29, 引自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开放杂志出版社, 2004年5月第一版, 第81页。
- 30, 高宜《最黑暗的夜晚》, 载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 中信出版社, 2014年5月第一版。

- 31, 《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的谈话》(1964年8月25日), 载, 《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版, 1961—1968年卷, 第220页。
- 32, 《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总检察长时的谈话》(1965年8月8日) 同上第314页。
- 33,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3月17日至20日) 同上第335页。
- 34,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3月20日华东) 同上第332页。
- 35, 《毛泽东给林彪同志的信》, 即“五七指示”。
- 36, 叶维丽《动荡的青春》, 新华出版社, 2008年8月第一版, 第110页。
- 37, 叶维丽《动荡的青春》, 新华出版社, 2008年8月第一版, 第107页。
- 38, 老鬼(当年第47中学学生马波)《血与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第一版, 转引自《文革受难者》第310页。
- 39,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23日), , 《毛泽东思想万岁》武汉版, 1961—1968年卷, 第349页。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